

清代人物传稿

清史编委会 编

下编
第十卷

罗 明
杨益茂

主编



K820.49

L 952

2 (10)

清史编委会 编

清代人物传稿

· 下编 · 第十卷

主编 罗 明 杨益茂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沈阳

(辽) 新

清代人物传稿

· 下编 · 第十卷

Qingdai Renwu Zhuangao

罗 明 杨益茂 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240,000 开本：850×1168 $\frac{1}{32}$ 印张：10 $\frac{5}{8}$ 插页：4

印数：1—440

1994年1月第1版 1994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高 虹
封面设计：赵多良

版式设计：赵耀今
责任校对：刘 涛

ISBN 7-205-02508-7/K · 290

定价：9.20 元

本书为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历史学科重点项目，在撰写过程中，得到国家资助。

《清代人物传稿》下编

编委会成员

戴 逸 林增平 苑书义
李文海 林言椒

目 录

光 绪	杜继东 (1)
宣 统	杜继东 (15)
杨 芳	徐永志 (20)
吴文镛	徐永志 (23)
牛 鉴	吕炳丽 (25)
怡 良	吴玉清 (28)
祁 藻	徐永志 (34)
颜伯焘	东 敏 (37)
郑祖琛	吕炳丽 (39)
陶恩培	董丛林 (41)
张国梁	徐永志 (44)
乌兰泰	董丛林 (47)
黄宗汉	董丛林 (50)
骆秉章	贾熟村 (53)
吴健彰	贾熟村 (58)
王茂荫	董丛林 (61)
毛鸿宾	董丛林 (64)
罗惇衍	董丛林 (67)
钱鼎铭	董丛林 (70)
刘岳昭	蒋中礼 (73)
刘春霖	王文成 (78)

曾国藩	杨国强 (82)
曾国荃	董丛林 (97)
蒋益澧	吕炳丽 (103)
李鹤年	吕炳丽 (105)
张曜	徐永志 (108)
李瀚章	贾熟村 (111)
奕 谿	杨益茂 (114)
沈桂芬	阎 湘 (127)
徐用仪	吴玉清 (132)
宝 鋆	关 威 (138)
李慈铭	董丛林 (140)
启 秀	邹爱莲 (145)
崑 冈	邹爱莲 (149)
孙家鼐	吴玉清 (151)
翁同和	张 浩 (158)
邓华熙	杜春和 (167)
吴凌云 吴亚终	东 敏 (174)
洪仁玕	杨遵道 (177)
林绍璋	东 敏 (186)
黄鼎凤	东 敏 (189)
陈阿林	巩 滨 (192)
宋景诗	徐永志 (197)
孙 眉	余齐昭 (201)
吴芝瑛	张莲波 (204)
唐群英	张莲波 (207)
张竹君	张莲波 (211)
马君武	马自毅 (216)
吕大森	杨鹏程 (220)

冯自由	沈其新 (223)
黄复生	王 炎 (228)
朱执信	王 杰 (231)
何海鸣	郭世佑 (238)
罗福星	林 颖 (244)
杨王鹏	郭世佑 (248)
唐 鉴	姚中秋 (252)
钱 江	吕炳丽 (257)
罗士琳	刘庆云 王立清 (260)
戴 煦	刘庆云 王立清 (264)
邹伯奇	刘庆云 王立清 (267)
俞 樾	杨念群 (271)
夏鸾翔	刘庆云 王立清 (281)
杨守敬	杨雨青 (284)
缪荃孙	姚中秋 (288)
沈曾植	马金科 (295)
陈 炽	马金科 (300)
严 复	董丛林 (305)
苏 舆	周国兴 (312)
巴夏礼	叶凤美 (315)

《清代人物传稿》下编1—10 卷篇目索引	吴孝英 (321)
后 记	(335)

光 绪

杜继东

载湫，爱新觉罗氏。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1871年8月14日）生于北京宣武门内太平湖东岸的醇亲王府。清朝入关后第九代皇帝，其父为道光皇帝旻宁第七子奕譞，母亲是慈禧太后的胞妹叶赫那拉氏。

咸丰帝逝，以其子载淳即帝位，以肃顺、端华等8人为顾命大臣。经祺祥政变，顾命大臣或死或囚，清廷的统治形成以慈安和慈禧二太后垂帘听政的格局。因同治帝载淳年幼，慈安沉静，大事多决于权力欲极强的慈禧太后。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五日（1875年1月12日）19岁的同治帝病逝，无子嗣。按清廷“家法”，需从皇室近支的晚辈中选一人立嗣即帝位，且同治帝生前曾向军机大臣李鸿藻口授遗诏，提出为他立嗣的愿望。但这样一来，慈禧就成了太皇太后，不能继续垂帘听政。故慈禧置“家法”于不顾，力排众议，以自己的外甥载湫承继大统。当日，4岁的载湫即被迎入宫中，正式即帝位，改明年为光绪元年。正月二十日（1875年2月25日），载湫在清宫太和殿举行了登基大典。

翌年四月二十一日（1876年5月14日），光绪“入学读书”^①，以紫禁城内斋宫右侧的毓庆宫为书房（又称上书房），师傅为内阁学士翁同和与侍郎夏同善。所有毓庆宫一切事宜，由醇亲王奕譞“妥为照料”。奕譞按慈禧旨意，给光绪帝安排了以儒家经典、历

代帝王治术、列朝实录、圣训等为主要内容的科目，由翁、夏二人讲习。此外还按惯例派满、蒙文师傅，教授满、蒙文字语言，命武臣传授“骑射技勇”^②。

慈禧为了让光绪从小顺从她，一方面恩威并施，使光绪既亲她又怕她，另一方面传谕翁同和等注重对光绪进行“孝道”的教育，以人伦孝道来束缚他的思想，造成了光绪思想上和性格上的软弱性。光绪七年三月十日（1881年4月8日），慈安太后暴病身亡，慈禧独揽大权，对光绪的控制更为严密。尽管如此，因光绪帝“颖悟好学”^③，翁同和等细心教读，光绪帝终学有所成，为“亲政”以后治国兴邦打下了基础。

光绪十二年（1886年），光绪帝16岁。光绪继位时，慈禧曾做过“一俟嗣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的保证^④，现光绪帝业已成年，不归政难平舆论，归政又于心不甘，慈禧便与奕譞、世铎等王大臣密谋议定，在光绪“亲政”后仍由慈禧“训政”数年。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日（1887年2月7日），光绪帝在紫禁城举行“亲政”仪式^⑤。但这实际上是慈禧“训政”的开始。

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1889年2月25日），光绪帝举行大婚典礼。皇后是慈禧胞弟桂祥之女，妃为礼部左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即珍妃和瑾妃）。二月初三日（3月4日），在太和殿举行了光绪正式“亲政”的典礼，慈禧移住花巨资扩充修建的颐和园。由“训政”到“撤帘归政”，慈禧对光绪的控制有所放松。但是，她在“表面上虽不预闻国政，实则未尝一日离去大权；身虽在颐和园，而精神实贯注于紫禁城也”^⑥。朝中许多大员都是她提拔起来的，唯其“懿旨”是从，逐渐形成了以军机大臣孙毓汶及世铎、奕劻和徐桐等亲贵为主的“后党”。与此同时，“朝士之守正者”愤愤太后干政，逐渐聚集在光绪周围，形成了帝党，主要人物有帝师

翁同和、珍妃及其堂兄礼部侍郎志锐、工部侍郎汪鸣銮、户部侍郎长麟等。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之间因朝鲜问题而爆发战争。面对日本的侵逼,光绪帝极力主战。战前,手握大权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对英、俄等列强抱有幻想,立足于和,不做认真的战守准备,光绪帝一再降旨督促。五月二十八日(7月1日)更明降谕旨:“现在倭焰愈炽,朝鲜受其胁迫,势甚岌岌;他国劝阻亦徒托之空言,将有决裂之势。……我战守之兵及粮饷军火,必须事事确有把握,方不致临时诸形掣肘,贻误事机。”^⑦六月二日(7月4日)更申明,对日本的侵略,“中朝自应大张挞伐,不宜借助他邦,致异日别生枝节”^⑧。由于光绪帝旗帜鲜明,朝野上下主战的呼声愈来愈高,同时,李鸿章等待英、俄等国“调停”的希望则完全落空。七月一日(8月1日),光绪帝颁发对日宣战上谕,并“著李鸿章严飭派出各军迅速进剿”^⑨。七月十六日(8月16日),李鸿章来电鼓吹“联俄”。对此,光绪帝下谕“力言俄不能拒,亦不可联,总以我兵能胜倭为主,勿盼外援而疏本务”^⑩。十月,美国公使田贝出面调停,光绪帝表示反对,曰:“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进之时,而云停战,得毋以计误我耶?”^⑪十月二十五日(11月22日),日军攻占旅顺。两天后,光绪帝下谕严责李鸿章“未能迅赴戎机,以致日久无功,殊负责任。著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以示薄惩”^⑫。战争期间,太后及其党羽孙毓汶、李鸿章等从未放弃求和之念,也未停止求和活动,今李鸿章受惩戒,无疑是对后党的一大打击,引起太后极大不满。三天后,她亲自召集枢臣会议,宣示懿旨,以“干预朝政”的罪名,将瑾妃和珍妃“降为贵人,以示薄惩,而肃内政”^⑬。随后又把坚决主战拒和的志锐发往乌里雅苏台,削弱主战派的力量。十二月,在太

后和李鸿章等的策划下，户部侍郎张荫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赴日求和，遭拒绝后又派李鸿章为全权代表东赴日本。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代表签订《马关条约》，内容有割辽东、台湾及赔款等项，引起全国舆论大哗，光绪帝也坚决反对。二十七日条约文本送至北京。第二天，主和派中坚分子孙毓汶即“捧旨逼上（光绪帝）批准，海盐（徐用仪）和之”。在翁同龢等的支持下，光绪帝由“迟疑”到坚决“不允”^⑨，使求和派的第一次逼签活动没有成功。当时，无论王公大臣还是庶民百姓，均人心激愤，要求废约拒敌的呼声很高。本意主战的光绪帝受到鼓舞，信心大增，“意欲废约颇决”^⑩。二十九日，有大臣鼓吹“让台”，他当即给予“诘责”，并指出：“台割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⑪四月初三（4月27日），光绪帝亲往颐和园面见太后，要求拒和废约，迁都再战，遭到一心要求和苟安的慈禧太后的断然拒绝。四月初八日，在孙毓汶、徐用仪等主和派的包围和催逼下，光绪帝忍痛批准了条约。当时，“众枢在直立候，上（光绪）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奋笔书之”^⑫。四月十四日，中日双方代表在烟台完成换约手续，《马关条约》正式生效。七月九日（8月28日），李鸿章奉调入阁办事，被免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入朝陛见时光绪帝斥他“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⑬。由此可见光绪帝对和议结局极为不满。中日甲午战争是光绪帝“亲政”以后遇到的第一件大事。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光绪帝有“职”无权，他虽有抗战拒敌的决心，也有迁都再战的勇气，但因太后和主和大臣多方掣肘，光绪帝终难有作为，只得接受了战败求和的事实。

甲午战争的结局对光绪帝和朝野有识之士刺激极大。一方面，

中国割地赔款，损失惨重，动摇了国本。另一方面，列强掀起争夺租借地的狂潮，中国面临瓜分之祸。中国往何处去？是求变图强还是坐以待毙？光绪帝选择了前者。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说：“自甲午、乙未兵败地割，求和偿款，皇上日夜忧愤，益明中国致败之故，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⑧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光绪初次见到康有为鼓吹变法的奏折，即“览而喜之……命即日抄四份，……一存乾清宫南窗小篋，一存勤政殿备观览”^⑨。顺天府尹胡燏芬也上折请“急求雪耻之方”，“求皇上一心振作，破除成例，改弦更张，咸与维新”^⑩。还有一些人也纷纷上书陈情变法，掀起了“竞言自强之术”^⑪的热潮。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五日（1895年7月7日），光绪帝发布上谕，以求振兴，曰：“近中外臣工条陈时务，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抵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皆应及时兴举。至整顿厘金，严核关税，稽查荒田，汰除冗员，皆于国计民生多所裨补。直省疆吏应各就情势，筹酌办法以闻。”^⑫这是光绪变法图强的起步阶段，“变”的广度和深度还很不够。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是戊戌变法的序幕。

1897年冬至1898年春，德国和俄国先后强占胶州湾和旅大，对光绪的思想更产生了猛烈的冲击，变法图强的心情更加迫切。梁启超写道，光绪帝“既无权则惟以读书为事，故读书极多。昔岁无事，旁及宋、元版本，皆置懋勤殿左右，以及汉学经说，并加披览。及胶、旅变后，上怒甚，谓此皆无用之物，命左右焚之，太监跪请不许。大购西人政书览之，遂决变政”^⑬。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冬，康有为进呈《上清帝第五书》，请求皇上“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下发愤之诏，先罪己以励人心，次明耻以激士

气，集群才咨问以广圣听，求天下上书以通下情，明定国是，与海内更始”，“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大集群才，而谋变政”^②。这些激烈言辞对光绪触动很大，决定召见康有为面询救亡之计，但恭亲王奕訢以“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见”^③为借口加以阻挠，召见之议被搁置。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八日（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明确指出：“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中心意思是要“大变”^④。康有为还随折呈上自己写的《日本变政考》和《俄彼得变政记》供皇帝阅览。光绪还通过翁同龢和找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及英人李提摩太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等书，“置御案，日加披览”^⑤。这些书使他眼界大开，对中国和世界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面对“各国环处，凌迫为忧”的局势，他深切认识到，“非实行变法，不能立国”^⑥。

甲午战争以后，在康有为等人的宣传下，国内变法维新的呼声越来越高。光绪二十四年春，康有为等在北京成立“保国会”，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进一步推动维新运动的发展。这引起顽固派官僚的仇视，纷纷予以攻击。御史文悌弹劾康有为“招诱党羽，因而犯上作乱”，“名为保国，势必乱国”^⑦。但光绪指出，“会为保国，岂不甚善！”^⑧驳回了弹劾。当时围绕变法问题，清政府上下又形成帝党和后党对抗的格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因循苟安，力持“祖宗成法不可改，夷法不足效”^⑨。慈禧虽身在颐和园，但时刻不忘紫禁城，其心腹刚毅、世铎、荣禄及奕劻等人也不断将光绪的动向“传达于太后”。太后还派出大批亲信太监监视光绪帝的行动。为摆脱太后控制，顺利推行维新政策，光绪帝明确向慈禧要权，“因使庆王（奕劻）告西后曰：‘朕不能为亡

国之君，若不予我以权，宁逊位而已。’西后虽愤甚，然因别有所图，始听皇上之所为。”^⑧四月初十日（5月29日），后党阵营的重臣恭亲王奕訢因病去世，形势变得更加微妙，太后便以退为进，表示“由他（光绪）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⑨。她让奕劻转告光绪：“皇上欲办事，太后不阻也”^⑩。这样，光绪帝获得了一定的权力，为变法维新做好了行政事权方面的准备。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进行变法维新：“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⑪此诏颁布后，“举国欢欣”^⑫，“臣民捧读感泣，想望中兴”^⑬。然而，顽固派对此不以为然，“哭求太后劝阻”^⑭。太后没有正面阻挠，而是采取迂回策略，于四月二十七日（6月15日）“勒令”光绪连发四道上谕：一、以“渐露揽权狂悖”的罪名将翁同龢革职，逐出京城，使光绪失去了左右手；二、令二品以上文武大臣直接向慈禧太后谢恩陛见；三、任命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四、秋天由光绪帝“恭奉”太后到天津“阅操”^⑮。这是慈禧太后准备伺机反扑的一个重要步骤。正如梁启超所说：“上之师傅亲臣在枢垣者已见逐，太后既已归政，例不见臣工……忽令二品以上大臣谢恩陛见，并令外官具折，盖训政之事已发于是。荣禄为西后第一亲信之臣……不入枢垣辅政，而反出督直隶，盖以统北洋三军。预发天津阅兵之诏，以谋行废立之事也……此实幽废皇上，诛捕帝党之先声。”^⑯尽管如此，光绪帝变法维新的决心丝毫未变。第二天

（6月16日），他打破皇帝不召见四品以下官员的成例，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命康“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并许其有“专折奏事”的权力。

变法维新的具体措施均由光绪发布上谕布告天下。自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至9月21日变法失败的“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发布的维新诏令共有大约180条之多，内容非常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各方面。主要内容有：荐才用才，谕各省督抚学政及三品以上京官保荐通达时务之才，不论官大官小，破格任用；兴学育人，在京城筹办京师大学堂，各省、府、厅、州、县的大小书院及民间祠庙“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省会设高等学校，郡城设中等学校，州县设小学校，以便“广育人才”；废除八股，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一律改试策论，以选拔通达时务的人才；改革行政，裁机构，减冗员，改定行政规章，切实整顿吏治，以除积弊而行新政；广开言路，准许各省藩（布政使）、臬（按察使）、道、府、州、县官及士民上书言事；提倡办报、译书以“开广见闻”；鼓励游学，选派宗室王公出国“游历”，青年学生出国留学，以“开通风气”，造就通才；振兴工、农、商及交通各业，设立铁路矿务、农工商总局和提倡私人办企业；整顿民事，改革财政，严禁各级官吏“扰民”，命户部编制每年的财政预算表；裁减旧军，重练新式陆海军，以期富国强兵等等。“百日维新”既是一场政治改革运动，又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光绪帝是这场运动的组织者和推动者。

光绪帝的变法措施刺痛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他们把持中央各部和大部分省区的行政大权，基本上是些“庞然大物”、“贪劣昏庸”，只图“高爵厚禄”而“置国事于不问”的人^④。他们有的对变法诏令阳奉阴违，有的置若罔闻，有的甚至公然对抗，使

变法维新措施难以贯彻执行。对此，光绪帝采取了一些针对性的措施。六月二十三日（8月10日）以来，他连下数道谕旨，对顽固大臣“墨守旧章”、“胶执成见”和“面从心违”的行径给予严责^⑤。七月十日（8月26日），他严厉谴责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两广总督谭鍾麟对新政“意存观望”^⑥。“此谕虽明责谭、刘，实则深恶荣禄”^⑦。七月十九日（9月4日），他把阻挠新政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六堂官全部革职。第二天，他谕令拥护新政且有才有识的杨锐（内阁侍读）、刘光第（刑部候补主事）、林旭（内阁候补中书）和谭嗣同（江苏候补知府）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以国政系于四卿，名为章京，实则宰相也。后此新政，皆四人行之，密诏传授，亦交四人焉”^⑧。七月二十二日（9月7日），他又降旨开去李鸿章和敬信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之职。两天后，他颁谕宣布，为了“妙选才能，以议庶政”，在中央设置三、四、五品卿和三、四、五、六品学士（即“散卿”和“散学士”）。

就在光绪帝大行新政之时，守旧官僚也聚在慈禧左右，加紧了密谋活动。新旧两派的矛盾日益激化，宫廷政变一触即发。七月二十八日（9月13日），荣禄密调聂士成武毅军入天津，董福祥甘军驻北京西南的长辛店。同一天，光绪帝感觉到情况不妙，给康有为写了一道密谕：“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⑨康有为曾建议光绪帝抓兵权，“亲握甲冑而统之”，并认为袁世凯可救光绪^⑩。所以，光绪在八月初一和初二日（9月16和17日）两次召见袁世凯，加以抚慰。谭嗣同于初三日（18日）夜密访袁世凯，要

他“诛荣某（荣禄），围颐和园”^⑨。袁假意答应，却向荣禄告了密。八月初四（9月19日），慈禧太后自颐和园返回紫禁城，荣禄也潜回北京。光绪自知事已不可为，对枢臣说：“朕不自惜，生死听天，汝等肯激发天良，顾全祖宗基业，保全新政，朕死无憾。”^⑩第二天，太后在帘后监听了光绪和日本维新重臣伊藤博文的谈话。初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派人把在中和殿阅祭文的光绪帝押解到中南海的瀛台囚禁起来，并于当日以光绪帝名义颁谕宣布由太后“训政”^⑪，光绪帝“亲政”时期结束。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谭嗣同、林旭等六君子惨遭杀戮，其他参与维新的官员或被革职或被流放，变法诏令尽被废除，被裁的机构照常设立，被黜大员官复原职，除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外，其余变法成果荡然无存，光绪君臣的一片心血付诸东流，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终告失败。

慈禧太后对光绪恨之入骨，曾三次当着群臣之面严斥光绪：“汝何昏愤，不肖乃尔！”^⑫把“离经叛道”、“变更祖法”的罪名加到他头上。她把光绪囚在瀛台涵元殿，撤除瀛台与岸上的板桥，命李莲英选出亲信太监20名轮流看管。此外，她还对珍妃施以刑杖，囚于偏僻的钟粹宫旁的北三所，永远“不许觐见”光绪帝^⑬。慈禧等在政变时就想一举废掉光绪帝，在囚禁他的同时，又“令太医捏造脉案”^⑭，谎称光绪患了病，欲借此谋废立之事。终因中外舆论哗然而未敢采取行动。工商人士经元善等人于在上海的一些华侨联名致电慈禧太后，吁“请保护圣躬（即光绪）”^⑮。张之洞采取观望态度，刘坤一则复电荣禄：“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难防，坤一为国谋者以此，为公谋者亦以此。”^⑯英、日等国驻华公使也要求见光绪帝，查看光绪帝的病情及其下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太后等暂时放弃了废帝计划。